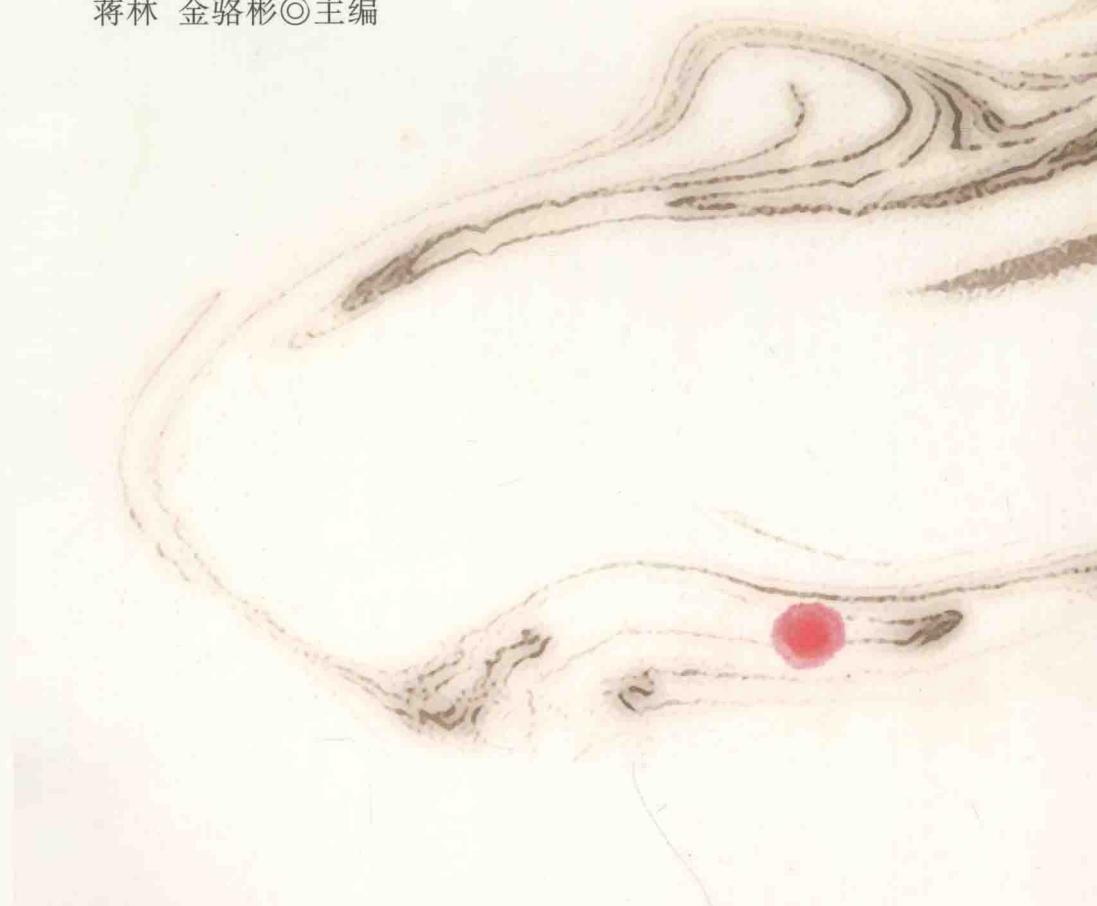


来自东方的视角

莫言小说研究论文集

蒋林 金骆彬◎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来自东方的视角

莫言小说研究论文集

蒋林 金骆彬◎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东方的视角：莫言小说研究论文集/蒋林，金骆彬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

ISBN 978 - 7 - 5161 - 3876 - 2

I. ①来… II. ①蒋… ②金… III. ①莫言—小说研究—文集
IV. ①I207. 4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190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炳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net>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3

字 数 235千字

定 价 4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莫言



莫言



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



莫言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出席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中文版序

对于我这种专业背景不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外行人”来说，编辑这样一本中文版的《来自东方的视角：莫言小说研究论文集》委实令人奇怪。在此，我非常乐意交代事情的缘由。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我一直在高校从事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 2005 年到 2008 年我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中国翻译家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撰写了题为《梁启超“豪杰译”批评》的博士论文（2009 年 1 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梁启超“豪杰译”研究》）；后来又逐渐转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英译研究，重点考察其作品在海外的翻译、传播、接受和影响情况。而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我十分欣赏莫言、余华、苏童、马原等人的作品。在我看来，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数量近年来在逐渐增加，但真正能走出国门、走进目标语文化的文学作品却很少。而这些先锋派作家在这方面起着表率作用，他们的作品在不断地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和关注度。而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英译研究无疑是翻译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自 2009 年起我指导三位翻译方向学术型研究生对余华、苏童和莫言的英译作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2012 年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结合自己的翻译专业优势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对于莫言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在英语世界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因此对我来说，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013 年 2 月，我历时一年多翻译完了一本名为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

pretation, Pedagogy (中文名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理论、阐释和教学法》, 2013 年 5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的学术性论文集。这本书由美国两位著名生态女性主义学者 Greta Gaard 和 Patrick D. Murphy 编辑, 一共收录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 12 篇代表性论文。在我进行第三次样稿审校时, 这本论著的结构和设计思路突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为何不借鉴它也编辑一本关于莫言小说研究的论文集并将它译成英文后出版呢? 而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 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学者对莫言的研究成果并不被英美学术界所了解。

于是, 我开始系统收集和整理多年来关于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论文 1500 多篇, 并对其中的 150 篇进行了认真的阅读, 在考虑到论文集篇幅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筛选最终收录了 18 篇代表性论文, 这些文章涉及宏观、微观和比较三个方面。宏观的论文共有 8 篇, 包括李敬泽的《莫言与中国精神》、郭杰的《独创性和超越性: 莫言的启示》等; 微观的论文主要是针对莫言的小说如《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等, 共计 9 篇; 还有一篇是比较莫言与福克纳的论文。由于收录的文章主要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 故我把论文集定名为《来自东方的视角: 莫言小说研究论文集》。我收录的原则和标准均侧重论文选题和研究的深度, 由于“外行人”的身份, 我没有受到其他“内行人”在收录论文时可能遇到的各种困扰。事实上, 在获知收录的论文作者的基本信息后, 我还曾为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沾沾自喜”过一阵子。

在取得 18 篇论文作者的版权授权后, 我成立了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翻译小组, 成员由与我共事多年的同事夏建新、唐艳芳、李艳和陈芳蓉, 以及我的研究生金骆彬和 Marco Lovisetto 组成。我们落实了分工, 明确了工作进度, 并定期举行研讨。整个翻译工作于 2013 年 6 月正式启动, 虽然收录的大多数论文内容艰深, 再加上中国大陆过去二三十年的学术规范与西方大相径庭, 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经过不断的努力, 我们仅历时一个月就高质量地完成了 6 篇论文的翻译。另外, 我还邀请了前面提及的、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主任 Patrick D. Murphy 教授担任合作编辑, 所有的初译稿由我和 Murphy 负

责审校和修改。与此同时，由 Murphy 负责联系的多家美国出版机构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和 Palgrave Macmillan 均对《来自东方的视角》的出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计划在 2014 年 7 月前完成所有论文的英文翻译，2015 年上半年在美国出版发行。

2013 年 7 月中旬，我与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院长李贵苍教授在北京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先生，洽谈继续开展进一步合作的相关事项（我和李教授共同担任了由赵先生策划的“生态文学批评译丛”的主编，该套译丛涉及国外生态文学批评的 10 本经典论著，我负责翻译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是其中的一本）。在会见期间，赵先生听说我正在编辑、翻译《来自东方的视角》时，建议我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行出版该论文集的中文版，他认为国内中文版与国外英文版的出版并行不悖。尽管之前有几家大学出版社曾找我商谈过论文集的出版事宜，但我一直没有在国内出版中文版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我对自己作为“外行人”的身份缺乏足够的自信。但经过认真考虑后，我最终接受了赵先生的建议。

在该书出版之际，我要向所有的论文作者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版权授权，本书的翻译与出版也就无从谈起，我尤其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李敬泽先生、华南师范大学的郭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柠教授、武汉大学的陈国恩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的吴耀宗助理教授、台湾中华大学的周英雄教授等（恕不能一一列出）在发给我的邮件里给予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同时，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赵剑英社长和浙江师范大学的李贵苍教授，你们的关心与无私的帮助使我备受鼓舞，敦促我不断前行。另外，我还要感谢参与翻译项目的所有小组成员，这些年我们以低调务实的态度，发挥翻译团队的整体优势，致力于本土文化外介工作，在李渔作品系列译著的出版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立项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最后，我也要向帮助我打印文字资料、联系论文作者、邮寄授权协议书的金骆彬、潘雨晴、施宵宵、潘雯辰等四位研究生表达我的谢意，感谢她们为我做了这些虽然琐碎但又非常重要的事情！

作为一名高校翻译专业教师，我认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

4 来自东方的视角:莫言小说研究论文集

背景下应该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充当起中西文化沟通和交流的桥梁。正如我在发给论文作者的电子邮件里所说：“莫言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我们有责任将东方学者对其作品取得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让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学术界了解与认识。将中华学术传播到海外，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这一代翻译工作者的义务！”

是为序。

蒋 林

于浙江师范大学

2013年7月31日

目 录

第一章	莫言与中国精神	(1)
第二章	独创性与超越性：莫言的启示	(10)
第三章	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	(21)
第四章	文学与民间性	(42)
第五章	论莫言1985年后中短篇小说的叙事视角试验	(65)
第六章	莫言“种的退化”的历史哲学	(81)
第七章	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	(91)
第八章	神话结构的自由置换	(104)
第九章	记忆术：代际隐喻、意识幻象与记忆场	(120)
第十章	童年叙事：意义丰饶的阐释空间	(133)
第十一章	轮回·暴力·反讽：论莫言《生死疲劳》的荒诞叙事	(145)
第十二章	神魔共舞的狂欢化叙事	(160)
第十三章	历史的意象与意象的历史	(171)
第十四章	《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	(184)
第十五章	酒国的虚实	(194)
第十六章	历史的挽歌与生命的绝唱	(202)
第十七章	“生命政治”与历史书写	(216)
第十八章	福克纳与莫言：故乡神话的构建与阐释	(229)

第一章

莫言与中国精神

李敬泽

一

莫言已成“正典”。他巨大的胃口、充沛的体能，他的欢乐和残忍，他的宽阔、绚烂，乃至他的古怪，近二十年来一直是现代汉语文学的重要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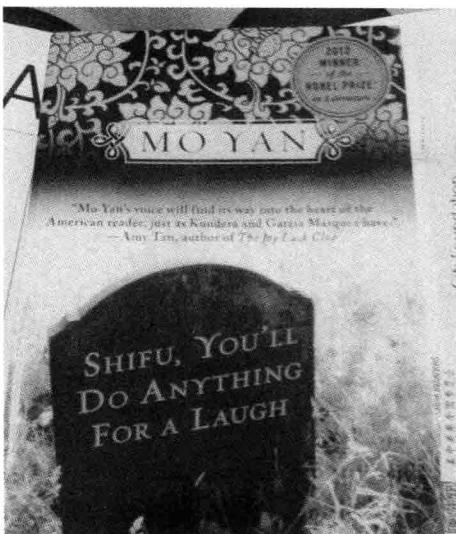
尽管莫言可能是承受了最高声望的作家，他被反复阐释甚至过度阐释，但他却不是特别令人喜爱或令人厌恨的作家。在中国，一个人可能厌恨王朔，因为王朔冒犯了他；也可能无保留地喜爱王安忆，因为王安忆为他提供了一种对自身经验和生活的想象方式，但大概很少有人以同样的激情对待莫言。当然，身处剧烈的文化冲突的时代，莫言始终面临各种偏见和误解，他有固执的反对者，但无论反对他或支持他，人们都很难确定一种简明的、自足的立场，莫言过于宽阔，人们难以确定他的要害。

通过喜爱或厌恶什么作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整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确认自己是什么人。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有助于形成社会的自我意识，同时也必然地被社会意识分类、编纂。这是一个博尔赫斯式的情景：一本一本的书被写出来，堆积在巨大、阴暗的图书馆中，幽灵般的图书馆员忙碌着，他们凭着嗅觉就能把大部分书送进碎纸机，然后把剩下的书沿着大脑沟回般的通道上架、归档。

那么，莫言将引起争议，究竟把他存于何处？

——这种想象中的困难，体现了莫言与他的时代、他的时代中的读者和文学的复杂关系。

二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

莫言很少对他的时代直接表达看法。他的作品中最具共时性志向的也许是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但这无疑是一次失败。在小说中，下岗的老工人不得不以一种颇具讽刺性的方式谋生，他在荒僻的林间开设了一座情人小屋。由此，“下岗”这个社会性的主题暗自转化为了“欲望”的喜剧，“排泄”（情人小屋的创意由收费厕所而起）、窥淫（师傅守在屋外——眺望）、身体和金钱（两者互相激发、互相证实）、中心与边缘（是去市政府闹事还是在城郊自生自灭？）、合法与非法（小屋如同一间容纳非法欲望的阁楼，它本身可能是非法的，但也可能被默许——以两条“中华”为代价），通过这一系列次生的主题，“师傅越来越幽默”了。

——这终究是莫言的小说。社会有社会的议程，作家有作家的议程，莫言几乎是蛮不讲理地把小说开上了他自己的轨道。莫言常常是粗暴的、不讲理的，他有绝对的自信，无论怎样他都能把事情摆平，但在《师傅越来越幽默》中，事情看来是摆不平了，尽管莫言轻易地抓住了要点，但在每个要点上他都无法展开，似乎他不幸误入一个没有宽度的世界，他只能尽快地穿过去，草草收场，这篇小说在莫言的作品中罕见的气力疲弱。

失败往往标明了一个作家的限度，莫言如果从那间郊区小屋再往外

走、从某个世纪末的日子再往回走，一直走进田野、走进过去，那么他就会重新获得力量——这不是在谈论题材，而是说，莫言本身的艺术气质有一种天高地远的宏伟，他的眼光是总体性的、俯瞰式的，他所能看见的是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为何发生。这样一个作家如天地不仁，他需要把伦理和美学的自由保存在自己的手里，人的所有弱点、人的所有感觉和经验皆如草木荣枯，雷霆雨露、白云屎溺皆是壮阔、自在，没有任何外在尺度。

所以，尽管莫言因《红高粱》而广为人知，但在此前的《透明的红萝卜》中，他的世界的基本元素已经就绪。这篇小说对当时的主流文学界来说是个丑闻，而对莫言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则是一次大胆的挑战、一次袭击。而在今天，它看上去其实是平和的、美丽的，只有当我们注意到那个在田野上游荡的少年实际上没有理由时，我们才能看出它在当时的危险性——

一个精灵原来不需要理由。同样地，《红高粱》、《狗道》中，人物从不思考，他们只是感受、行动，他们的世界是被呈现的，而不是被阐述、被评估。如果说，《红高粱》中你还可把日本鬼子理解为有具体历史内容的“恶”，那么在《狗道》中，“恶”仅是一种自然之力，是自然的属性，狗道亦是天道，天道亦是人道，人的挣扎和斗争不需要任何理由。

这种“齐物”的眼光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充分展现了它可能达到的深度：一群“右派”分子正在庆典般的欢乐气氛中奔跑，30年的时光滤去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进入了乡村传奇，每个人皆如《封神榜》上人，有各种奇技和怪癖。如果把这篇小说与莫言同时代的关于“右派”这一特殊人群、关于“文革”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叙事相比较，你会看出，后者通常预设一种历史理性，它为其中的每个人提供一个根本理由、一个“意义”的支点，即使这种意义相对于每个人来说常常显得不相称。也许我们必须谅解这种主流叙事的夸张、滥情和简化，但是，这种将个人在历史中合理化和合法化的不懈努力反映和强化了中国精神中“成王败寇”的偏狭一面。而《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那种惊人的欢乐和驳杂表明，莫言对用历史

覆盖生活怀有异议，当然，历史最终介入了这次长跑，警察来了，人被带走了，但这更像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意外，是一次“故障”，是生活中富于魅力的惊奇和秘密。即使“历史”也夺不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欢乐、丰饶，我们的生命力，莫言对此有一种大地般安稳的信心。

——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是我们的惠特曼，他有巨大的胃口、旺盛的食欲，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不能消化的，他刚健、粗俗、汹涌澎湃，他阐扬着中国精神中更宽阔的一面，那既是经验的、感觉的、身体的，又是超验的、终极的，超越自我、超越历史理性。

在《欢乐》中，那个屡考不中的乡村青年在田野上彷徨，他当然极度的苦闷、极度的累，我们或许可以由此进行社会历史的和个性的考察，把它视为中国考试制度和乡村知识青年之间的一份心理学档案；但在莫言这里，人物的命运是与自然世界疯狂的丰饶和腐烂相互投射的，这种投射不仅是诗学的隐喻关系，更是确凿的判断：无论生或死，人永远要承受一切或舍弃一切，这就是生活的真相，也是自然的秩序，在莫言的世界中，人最不可能产生的情感就是可怜自己。

所以，我们的惠特曼其实也有他的限度，他说到底是个神话作家——尽管“神话”这个词在莫言的时代并不体面，但究其实质，莫言表达这个民族浩大的自我想象，很难说它是肯定性的或否定性的，也许莫言对此并不在乎，重要的是，现代性的焦虑、历史的焦虑在这种想象中被超越，这个被焦虑折磨得精神憔悴的民族在这些小说里获得一种自由：为善、为恶、为一切。

正因如此，莫言特别不适合处理诸如“下岗”这样的题材，这个题材本身隐含着具体的道德疑难，它涉及现代都市中人随时面临的琐屑、繁杂、模棱两可的各种界限。尽管莫言在《师傅越来越幽默》中蛮横地力图执行自己的议程，但当他以对人物处境的分析性陈述开始时，他已经注定失败，因为随着这种处境而来的是充塞着各种各样“理由”的世界，人只能在其中踟蹰，那如同漫天飞尘，莫言无法下咽，他吞得下一切，除了尘土。

三

1. 《檀香刑》是一部伟大作品。

我知道“伟大”这个词有多重，我从来不肯在活着的中国作家身上用它。但是，让我别管莫言的死活，让我服从我的感觉，“伟大”这个词不会把《檀香刑》压垮。

2. 《檀香刑》的第一句看上去纯属败笔：“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

这太像《百年孤独》的第一句，我们知道，莫言也知道，但他偏就这么写了，似乎是自报家门，有意呈露他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血缘关系。

这是向马尔克斯致意，也是向马尔克斯告别。从第二句开始直到小说的最后一句，莫言一退十万八千里，他以惊人的规模、惊人的革命彻底性把小说带回了他的家乡高密，带回中国人的耳边和嘴边，带回我们古典和乡土的伟大传统的地平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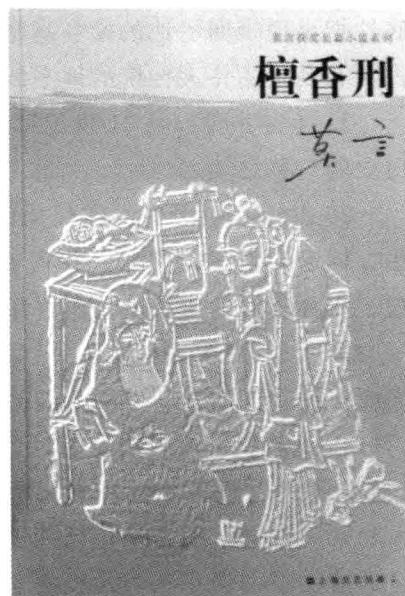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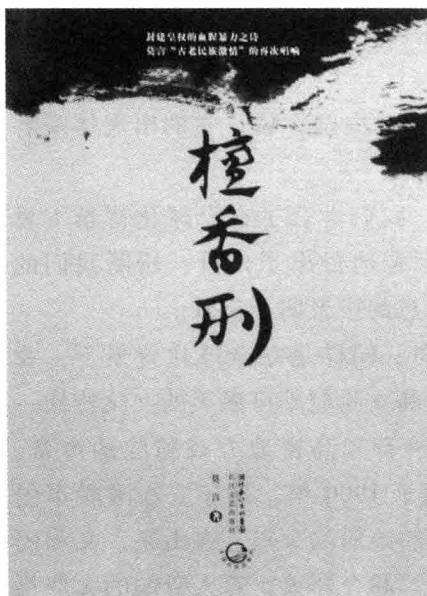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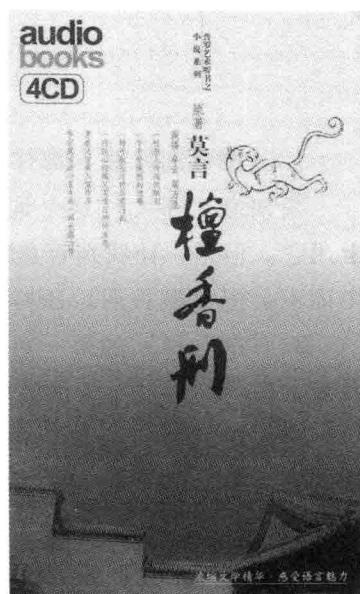
3. 《檀香刑》是21世纪第一部重要的中国小说，它的出现体现着历史的对称之美。

20世纪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世纪，我们学会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思想、体验和叙述，同时，我们欢乐或痛苦地付出了代价：斩断我们的根，废弃我们的传统，让千百年回荡不息的声音归于沉默。

而《檀香刑》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向，同样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接续我们的根，建构我们的传统，确立我们不可泯灭的文化特性。

4. 莫言说，他写了声音：火车的声音和高密地方戏猫腔的声音。《檀香刑》也是历史的声音。故事发生于1900年，是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古老中国的现代化危机达到空前绝后的顶点。在山东，义和团运动被德国占领军和西式装备的清朝新军联合扑灭，耸人听闻的大刑将在高台之上、万众之前展开……

这个场面很像演戏，这就是戏，在中国民间，历史是戏，戏是现实。让我们闭上眼，倾听1900年的声音，高亢的、愤怒的、绝望的、



莫言《檀香刑》

凄凉的、凶恶的、阴冷的，撕心裂肺荡气回肠，这是中国的声音，它像利刃一样穿透了一百年的时光。

5. 莫言不再是小说家——一个在“艺术家神话”中自我娇宠的“天才”，他成为说书人，他和唐宋以来就在勾栏瓦舍中向民众讲述故事的人们成了同行。

这不是指《檀香刑》采用了“凤头”、“猪肚”、“豹尾”之类古老的结构原则，而是指它的叙事精神：直接诉诸听觉，让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声音同样铿锵响亮；直接诉诸故事，却让情节在缭绕华丽的讲述中无限延宕；直接诉诸人的注意力：夸张、俗艳、壮观、妖娆，甚至仪式化的“刑罚”也是“观看”的集体狂欢……

——这是中国的民间美学，大“俗”久不作。

6. 说书人需要训练，做一个传统的说书人要比做现代小说家难得多，因为现代小说家可以放纵自己，哪怕把读者吓跑或气跑，而一个说书人的至高伦理是听众必须在，一个都不能少。

《檀香刑》中，莫言表现了精湛的艺术功底——我这么说似乎不是在夸他，哪个小说家不觉得自己功底精湛？但是，大多数中国小说家并无功底可言，他们顶多是聪明或绝顶聪明，但他们甚至没有能力让两个不同的人物说不同的话。因为他们把小说当成自己的事，从“我”开始，到“我”结束。

当莫言模仿说书人时，他回到了小说艺术的原初理想：小说家没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声音，讲故事如同在讲已经发生、尽人皆知的事，而声音是世界的声音，它封闭在故事中，等待着一张嘴张开，让它流动、激荡。

7. 我们对小说艺术的思考方向，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自身境遇的思考方向都将改变。这种改变在社会、文化和文学事件的涌动中正在逐渐显现，而《檀香刑》是一股强劲的推动力，它使混沌变得清晰，使低语变成呼喊，它写出的是我们的历史，但它也在形成文化和文学的未来历史。